

# 社会转型与儒家传统视域中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解析

● 席伟健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解决社会上的价值观认同问题,在涵括了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时代精神和道德标尺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基础上,提出了集中表述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准则和个体层面的价值行为。就这三个层面的价值观体系的自治性而言,内在的集体主义本位与个体本位的矛盾必须得到解释,否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难以理顺,会影响这一最新意识形态命题的可接受度。本文从社会转型中所遇到的不同价值观碰撞冲突出发,通过对儒家公羊学中的“三通三统”命题的阐述,力图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不同层面如何实现范式上的融合并存进行学理解释。

**【关键词】**社会转型;儒家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体;公民

**【作者简介】**席伟健(1981—),男,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社会学部副教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中日政治比较研究与中国古典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6)02-0019-05

## 一、现代中国治国理念的三个阶段与社会转型

早在19世纪60年代,殖民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欧风美雨”甫一侵袭华夏大地,李鸿章就敏锐地发现,这次华夏文明遇到的挑战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古老的中华文明这次遇到的挑战乃是异质文明的全方位挑战。虽然到甲午战争战败后,帝国士大夫才开始有“保国、保种、保教”的存亡忧患危机意识,但此时洞察力过人的李鸿章已经通过与西方列强的初步接触而把握到这个端倪。炎黄子孙从此开始了在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近代丛林世界中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漫漫征途。

按照王绍光(2014)对治国理念所作的划分,国家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涉及三个阶段和三种理念。首当其冲的就是治国能力,也就是从王朝国家蜕变为民族主权国家后,主权范围内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理论可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代表主权国家的执政力量能不能提供市场秩序扩展所需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即安全与秩序。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历经改良与革命的挫折与轮回,直至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并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组织路线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历经数次政治运动,才最终探索到一条解决治国能力的根本革命道路。

治国理念的第二个阶段,即政府管理阶段,新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全能主义国家与一元化党政领导体制。这一体制有助于集中中国有限的资源完成工业化积累,奠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并初步建立全面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政

治运动吞噬民间社会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走上认知范式的误区,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期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中,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传统文化伦理走向崩溃边缘。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后承认主义”的改革开放是倒逼出来的。然而,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尽管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原来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体制惯性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延续30多年的“体制奇迹”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和以行政指标发包承包为代表的压力体制。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没有这种体制,就没有中国持续30多年的年均10%的高经济增长率。

但从目前的形势判断,代价也非常明显。伴随着“三期叠加”的到来,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高速增长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比较密集地爆发,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难题。无论是严重的环境污染,还是“非正规经济”的发展模式所衍生的社会保障问题,乃至社会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都会对社会的安定有序以及社会心理产生严重的影响。由此,我们当前面临的是治理理念的第三个阶段,即国家治理阶段,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系统解决现代化产生的社会风险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转型期,1900年前后的美国对于我国或许更有借鉴意义,从1870年到1930年是美国的现代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

面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分化和  
社会冲突,从食品安全问题到环境保护和工人福利问题,  
美国在相关社会管理及公共治理领域所积累的经验,值得  
我们批判与借鉴。在我们尚未实现原本意义上的西方  
类型之现代化的时候,就必须提前考虑现代化本身存在  
在什么样的问题。罗荣渠(2014)指出,中国蕴含着内  
生性矛盾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呈现出一种混杂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的三个层面的斗争彼此交织在  
一起:殖民侵略与反殖民侵略之间的斗争,农业生产方  
式与工业生产方式的斗争,以及宗教革命的基督教文明  
与传统的非基督教文明的斗争。

经济上的崛起指日可待,但是要让中国在输出“中  
国制造”的同时也具有输出价值观的软实力绝非易事。  
文化的复兴涉及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博弈的问题,在几百  
年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中,东方相对于西方,首先是作  
为“异质文明”的东方,其次是“生产力欠发达、落后”  
的东方。现在,我们所做的赶超第一步是生产力标准的  
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定型方面的赶超,下一步应  
该是文明的赶超,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  
信。那么,对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价值观转型问题  
及其所衍生的国家提升濡化能力问题就必须予以高度  
重视。

首先,市场社会的问题。百年前涂尔干就曾指出,  
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市场机制不  
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会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  
模式。现代社会在面临急剧转型的时候,如果没有相  
应的替代物,作为社会内聚力的传统社会的“机械整  
合”状态和社会控制力的传统道德规范就会遭遇巨大  
挑战,进而导致社会出现失范现象。而依照波兰尼的  
观点,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调节  
的市场”的发育史,它的扩展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所谓  
的市场社会,原先是市场嵌入社会中,现在市场原则却  
通行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这个大转变就是“人类  
基本生计模式”的根本转变。这一转变最终导致各个  
国家内部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矛盾、危机乃至冲突。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中所谓  
的“压缩饼干”现象体现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关  
于这两次大转变,众多学术流派存在一条重要的研究  
路线,就是所谓的“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  
对市场社会乃至整个资本主义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基本立场是试图超越资本主义。

其次,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社会品质是所谓的群众社会,凭借忠于领袖的高度集  
中的政治信仰和单位、公社体制,整个社会处于高度  
整合的状态。同时,对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市  
场经济可能导致的社会影响和后果,即对于很多衍生  
性的社会问题,决策层始料未及。由于涉及意识形态  
及统治合法性等宏大议题,对于群众社会的品质,无  
法直接否认。但是,这种追求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状态,  
显然又与以承认

个人合法经济利益为逻辑起点的市场经济改革格格  
不入,中国政府急于让整个社会过渡到适合当前国情的  
所谓有机整合状态,即建立一个以不可分割的微观利  
益主体为最基本利益单位,追求利益与价值的“最大  
公约数”,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社会解体的出  
现。涉及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是,集体本位的社会  
实在论传统,以及当时尚处于社会潜流中的传统中国  
社会的差序格局都与以个人为最基本利益单位的社会  
唯名论传统具有不可比较性,导致一系列元治理问  
题的衍生与蔓延,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场域中放大  
了市场经济原本的阴暗面。

##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体系背景透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屋建瓴地提出“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角度,  
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是中  
国领导层在探索现代化道路上的最新理论成果与行  
动指南。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框架中,从20世纪  
末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二分法  
出发,当前应该切实推进作为他律机制的法治体系  
的完善,同时作为自律机制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建设和  
完善也显得越来越重要。2006年3月4日,胡锦  
涛首次提出把“八荣八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民  
行为的道德标尺。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三个倡导”,并要求各级党  
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广泛宣传并力图践行,要求做  
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国家层面的价值目  
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准则和个体层面的价值行为指  
导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寻求市场经济条  
件下所有人的价值公约数,并将其上升到“凝神聚  
气、强基固本的战略工程”这一高度。

党的十八大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  
度,提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  
战略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集体、个人三  
者辩证关系在价值观上的集中体现,体现了科学性  
与价值性的统一、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包容性  
和超越性的统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具备大  
众认同的理论品质和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  
的培育,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培育。对人的本质  
的追问与解读,是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的前提条件;  
对人生价值的探寻与升华,是基本方向;而对人的  
社会交往的不断扩展与深化,是根本途径<sup>[1]</sup>。

“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不同层  
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价值取向上,  
马克思主义强调为全人类谋福利,包括全人类物质  
财富的极大丰富、精神世界的极大满足、人的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强调了自然、人和社会三者的不可分割性。恩  
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强调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谐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在价值理念上,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的  
公平正义。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共产主义

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标。他们从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论及公正和平等。在价值目标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追求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sup>[2]171</sup>,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sup>[2]146</sup>。

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体系中,认同和濡化能力对于治理绩效与合法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迈克尔·曼(2007)有关国家权力性质的划分,国家权力可分为决断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各有其发挥作用治理国家的领域。但国家发展进入小康阶段后,社会利益格局高度分化与复杂化致使前者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体制性关系没有理顺,会产生治理内卷化现象,政府会陷入“塔西佗陷阱”。从党政一元化领导体制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留存下来的归口管理体制出发,意识形态及宣传领域的工作目前遭受的挑战更大,具体工作更难以用具体的量化指标来部署考核。同时,鉴于现在我国所处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使用以往的老办法来应对开放社会价值观与思想市场上的博弈,更显得捉襟见肘。

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看,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与主体建构功能。所谓社会整合,是指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将社会上各自独立而又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要素协调成相对统一的整体。所谓主体建构,是指通过特定的意识形态促使个体朝着既定价值方向发展,进而将个体塑造成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人<sup>[3]</sup>。

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个体将科学思想理论体系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意识、观念与语言的动态认知与内化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载体与教育方式等基本要素的有机匹配与相互作用<sup>[4]</sup>。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本质上是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的转变过程,最终表现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sup>[5]</sup>。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认知到评价选择再到接受认可,最后到情感和行为认同的过程,直至实现“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认同”<sup>[6]</sup>。有学者从利益机制与价值认同关系的视角出发,强调“利益机制对价值认同有基础、动力和杠杆作用”<sup>[7]</sup>。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通过利益引导和整合机制,稳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在中观层面,通过利益增进、分配和共享机制,扩大人民可以享有的公共利益,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认同的物质基础;在微观层面,通过利益平衡、补偿和保障机制,调适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约束价值分化。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包含着中国传统价值

观念的合理成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积淀了深厚的优秀文化遗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正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在吸取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继承和发展封建社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文明的丰富和创造,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源泉。

### 三、儒家公羊学传统视域中的“通三统”问题

在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体系中,有一个名为“通三统”的术语,它本为公羊学术语,其具体含义为,每个继起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自成一统,以应天命。但是,在孔子的政治理想中,他绝不赞同后起者将前朝的一切都加以否定。例如,周武王灭商之后,仍旧将商朝的遗民分封在宋国,而将夏朝的遗民分封在杞国,尊重他们的传统,孔子将这种行为称为“兴灭国,继绝世”。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尊重前朝古老政治传统的文明表现,对一国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现代政治科学的视角分析,这也是一种对现有政权形式合法性的追求,要求以外在的符号和内在的德行来奠定对新政权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中国既往自成体系的宇宙解释图景,需要把这种图景背后的宇宙哲学和具体的与现代科学不符的内容分离开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否定“通三统”及其背后的哲学根据。至于其具体内容,大略如下:根据中国古代历法,一年十二个月之中,有三个月可以作为岁首(正月),即子月(现时农历十一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和寅月(农历正月)。若一个朝代以某月为岁首(正朔),就要确定相应的朝服、车马仪仗等的颜色。夏代以寅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于是,夏朝的朝服、车马仪仗等都尚黑,是为黑统。商朝以丑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而商朝尚白,是为白统。周朝以子月为正月,其时“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于是,周朝一切尚赤,是赤统。这就是所谓的“三统”。中国古代士大夫认为,三统循环是天意的显示,每个朝代的新统治者受天命为王,都必须按照在三统中循环的位置,相应地确定和改变正朔、服色等。否则,就是不显不明,违背天意,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政权的统治不具备根本的合法性。

甘阳曾在题为《新时代的“通三统”》的演讲中化用延伸了这个古老的传统,提出目前在中国可以看到三种传统:其一,改革开放形成的传统,虽然这个传统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尚短,但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很多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传统。这个传统主要以市场为中心,延伸出很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概念,例如自由、法治以及权利等。具体而言,社会层面的价值准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是这个传统的当代表

述。其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在所谓的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追求正义。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我国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导致很多民众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因为这个价值中寄托着中国人最深层次的社会理想。其三,华夏文明数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根本的。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主要表现为注重人情和乡情的传统。牟宗三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体现,表现为一种通达而讲究情理的处世哲学。

著名学者何怀宏(2005)对于所谓的“三统”,也有类似的想法,他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三种“传统”是三种主要的赓续性力量,同时参与塑造我们当前的现实。第一种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年传统”,其最重要的表现是市场经济勃兴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和国力的迅速崛起,以及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极大改变。第二种传统则是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形成的“百年传统”或“世纪传统”,它给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持久的激荡和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三种则是“千年传统”,是“中国在它真正面对西方和异己的一个‘世界’之前、在漫长的两三千年中形成和发展的传统”。这三种传统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而“合”的阶段其实才刚刚开始,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必须努力接受一个主要由三种传统糅合的现实。

然而,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有些讨论当中,这三种传统似乎常常被置于一种互相排斥的状态,有些人会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种传统而排斥其他传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充满着争论,特别是涉及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对于一些改革受益者来说,他们会将那个时代的历史看成“国将不国”的漆黑一片;对于那些为改革开放付出了代价的人来说,他们憎恶改革开放年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传统价值,从道德层面对其予以否定,至于一些传统文化的热心拥趸,他们则无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绩,一味强调调存的问题,并提出诸多过激的观点。显然,这都是无视现实的盲目表现。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国,重新检视社会各阶层对于中国所持的看法。习近平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种理性的态度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一些学者在党史国史上的具有误导性的断章取义的论述。

学者谢淑丽认为,毛泽东时代实际形成了中国式的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统一。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是高度的政治集权,即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另一方面则形成了高度的行政分权特别是经济结构向地方倾斜的地方经济分权,摆脱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高度行政集权

模式。如果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着眼,实际上我们不应该把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对立起来,而是要作为一个历史“连续统”来思考。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是以毛泽东时代为基础的,所以没有必要把两个时代对立起来。我们需要摆脱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能把改革开放完全孤立起来,把它与前面的中国历史对立起来,就会无视两个时代的连续性。

此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中国漫长的独特文明传统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社会分化程度高、离心力大,因此,现代社会如果没有足够的传统文明凝聚力,社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关于这个命题,国内学者通过对“新轴心时代”与“轴心文明”的研究探讨积累了丰富的认识。总之,两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以及邓小平时代所形成的自由传统,应该被看作同一个中华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从公羊学的角度说,就是要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重拾传统,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判断力结合现实对其进行扬弃,也是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本质要求。

#### 四、主体传唤与公民教育:风险社会时代的西方政治传统与社会价值观培育

二战后法国著名学者路易·阿尔都塞(2011)曾经指出,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具有主体传唤、国家机器秩序维护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功能。其中,主体传唤意味着统治阶级能够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媒、文化等方面,以意识方式发挥作用,确保他们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使他们能够利用这架机器去迫使工人阶级屈从于剩余价值的掠夺过程并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法权安排。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由于缺乏掌控、影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能力与机会,耳濡目染被输入的统治阶级的价值就在其一言一行中产生熏染的作用,塑造符合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主体”。

牟宗三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中也曾经提出过“三统说”。不过,他的立论乃是着眼于如何从西方挖掘精神资源,重新整合为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他认为,要吸收西方的传统,必须了解西方政治文化史,有两个关键必须重视:一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先解放人为“灵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这是宗教的作用;二是自然法和天赋人权——再解放人为“实际权利的存在”“政治的存在”,每个人都是权利主体。前者肯定的是“超越的平等性”,是人类解放自己、冲破阶级的限制,实现其世俗地位权利之平等,以及创造其文化、抒发其理想之最根源的精神动力。后者实现的是“内在的平等性”,西方历代思想家关于“原始的、自然的平等性”的理论,通过人权运动与近代民主政体的建立,人始由“超越的平等性”进而获得其“内在的平等性”,由“精神的存在”进而为“权利主体”的存在,归根结底,是民主的社会环境的营造和具备民主之心智习惯的公民的塑造与培养。

在这个所谓“抵抗”<sup>①</sup>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具有大历史视野的思想激荡过程,只有从传统发掘新的精神力量,才能实现对所谓现代病的克服。

考察我国目前所处的世界大环境与特殊时代背景,从社会层面看,近30年来社会机体的转型带来的变化,已给激进的批判思想提供了足够多的理由和酵素: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的系统关联溶解为生活世界的经验关联,个体生活已从工业化的稳定状态和标准生活形式中游离出来,现代社会的结构在建制分化中已然碎裂<sup>[8]45</sup>。

针对现在这个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冲突加剧的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提出“反省的现代化”论。反省作为一项社会理论的诉求是指检审工业化现代的危机和后继问题,由此建构社会现代化的更新理论。由于现代化已被社会理论的主流理解为传统的理性化,“反省的现代化”论旨在建构适用于批判现代理性化的社会理论。贝克由此引导出两种科学化区分:初级的或传统的科学化与进级的或反省的科学化<sup>[8]52-53</sup>。一言以蔽之,如果理解这里所说的“反省的科学化”,就意味着要更深入地理解西方传统发展到今天的理论脉络。中国儒家讲君子修身处世要“反身而诚”,相对于“反思的现代化”,古人今人可谓心同理同。

另外,在政治文明和现代社会价值观建设领域,个人自由与共同体秩序间的两难困境一直是挑战所有现代与前现代社会和国家的宏大思想主题,归根结底,自由与秩序这两个诉求所意涵的内容本身是冲突的。托克维尔对个体自由的强烈维护和对原子个人主义的严厉批判,已经显出这种矛盾不可解决的性质,这也是我们在进行民主建设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基点。一旦现代社会的秩序以人意(民主)支撑的伦理原则和政治制度对象征资源的分配裁定成为正当性基础,建构自由的秩序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韦伯所谓“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表明了自由与秩序的两难<sup>[8]60</sup>。

因此,对于西方政治传统中一些重大而基本的原则的探讨,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当代中国的情况,首先,不能简单地以“国情论”的老调否定一切改革的努力;其次,必须对西方政治乃至文明的传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发掘,并结合本国实践,为既往传统的继承与新传统的开发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 五、结语:如何实现东西方价值观念认知范式的融会贯通

作为一个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笔者从中国方面来考虑各种传统价值观的碰撞问题,这是由东方“历史叙事中心主义”文明模式的特征所决定的。所谓历史叙事,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人的根本方面,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史家文化,详密的历史记录使得中国人对于“祖宗之言”有着宗教般的敬畏情绪,拿来作为为人处世的最高法则。

关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式思维方式的固有缺陷,黑

格尔(2016)也做出过并非毫无道理的批评,“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这样的评价也许有些偏颇,因为中国历史发展乃是遵循了自我的理性的,有自己的逻辑。

总之,对于任何社会科学研究,不管什么问题说到底都是一个价值的问题。西方社会早已进入后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时代,而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的现代化还远未实现,很多西方民主社会热烈探讨的问题如果直接被拿到当前的中国来讨论,很可能造成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制议程”、架构重组乃至价值观的重新塑造中,我们不该拘泥于古今中西之争,而要抱取取长补短的心态,既不必妄自菲薄,又不可不加分辨地盲目认同。至于如何从古今中外的各种形式的传统中发掘适于当代中国国情的精神及制度资源,如何认识那些传统,就是中国所有具有相同问题意识的知识人目前所需要做的理论探索工作了。

## 注释:

①这是日本学者、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所利用的术语,表达一种东方知识人在面对西方世界引领的现代化潮流时所持的挣扎与矛盾、努力寻求新出路心理。

## 参考文献:

- [1]张永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培育路径研究[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0(3):56-59.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徐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论析[J].齐鲁学刊,2013(6):66-71.
- [4]刘新庚,刘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动力要素与过程机制探索[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4.
- [5]张忠春,李万斌,张思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机制探析[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3):13-15.
- [6]祝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涵及可行性分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17.
- [7]谭培文.以改善民生为利益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5):133-138.
- [8]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 张小瑞

E-mail: ldkxzxr@163.com

电话: 0371-63934209